

# 周总理特殊的家规

1977年1月8日，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。这天，我离开部队到北京出差，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参观了周恩来同志生平事迹展览。

这个展览系统地展示了周恩来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，有许多展出内容是首次对外公布。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周恩来总理的家规。

周恩来总理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十分严格，他曾说：“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，还是他影响你？我呼吁，我们的领导干部包括我在内，都应该作出一点表率来。”

1964年，我国首次核试验前夕，周恩来在紫光阁主持召开重要会议。会议期间，张爱萍副总参谋长站了起来，向周总理告假，说当晚外交部安排了一个外事活动，要提前告退。就在张爱萍站起身来，刚准备离去时，周恩来突然从沙发上站起来，堵住了张爱萍的去路，关切地说：“爱萍，你带核试验的文件了吗？”在得到张爱萍没有带的回答后，他仍指着张爱萍的口袋，说再搜一搜，看看里边有没有纸条。最后，在周恩来的督导下，张爱萍将自己几个衣兜都掏了一遍。没有搜到什么，总理才如释

重负地说：“保密无小事啊！你邓大姐（邓颖超）是老党员、中央委员，她就不知道我们要搞核试验，我从不对她讲。”

从筹备自主研发原子弹，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，前后几年，周恩来对邓颖超只字未提有关核试验的事情。邓颖超是见到我国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报纸号外，才知道此事的。后来，张爱萍到总理家中汇报工作。汇报完后，邓颖超埋怨说：“你们说了好长时间的事原来就是原子弹试验，怎么之前连我也不告诉？”张爱萍笑着说：“总理说这项工作要保密，我也不敢违

反纪律呀。”

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门锁钥匙，他规定只有3把，秘书有一把，便于他们出入办公室整理文件等；警卫人员有一把，便于清洁和整理房间；他自己保管一把，成天揣在兜里不离身。邓颖超手里没有钥匙，她要进办公室，通常也得先敲门问一声再进去，这是他们夫妻间相约的礼貌与规矩。

周恩来、邓颖超是相濡以沫几十年的模范夫妻，但他们在处理公与私的关系上，泾渭分明，毫厘不爽。由此，伟人的崇高风范可见一斑。 艾立起/文

## 十三公里风雪路

在我10岁那年，家乡下了一场多年不遇的大雪。鹅毛似的飞雪从天而降，无声地飘了整整一夜。

清晨，雪小了些。推开门，天地白茫茫一片，房顶上、树枝上、院子里都积了厚厚的一层雪。母亲老早就起床生火，熬了一大锅热乎乎的红薯粥。

喝了红薯粥，身上顿时暖和了许多。母亲拿着笤帚来到院子里扫雪，突然脚下一滑，重重地摔倒在地，结果把腰扭伤了，痛得很厉害，只能躺在床上。傍晚时，母亲又发起烧来。奶奶急得不行，赶紧找人打电话告诉了父亲。

父亲在离家13公里外的一小镇当养路工人，因交通不

便，一天仅有一趟班车，一星期或半个月才回家一次。

父亲听说母亲的情况，非常担心，但班车已经没有了，他决定步行回家。天色已晚，父亲戴上帽子，穿上翻毛鞋，裹紧身上的棉大衣，揣上半瓶二锅头上路了。

听说父亲要回来，母亲就靠在床头等，不时听着门外的动静。

寒风一阵紧似一阵，直往衣领里钻。路上看不到一个人影，只有脚踩在雪地上发出的“嘎吱”声，风裹着雪打在脸上，生疼生疼的。雪地湿滑，尽是坑坑洼洼，借着手电发出的微光，父亲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跋涉。

雪越下越大，越来越密，父亲的脚步愈发沉重。他跌倒了就爬

起来，再跌倒就再爬起来。累了，他就停下喘口气继续走，冷得实在熬不住了，就喝一口二锅头提神，他甚至不敢坐下来休息片刻，怕坐下就再也站不起来了。

翻过最后一个坡，终于快到家了。父亲精神一震，加快了脚步，朝着家里的灯光奔去。

“咚咚咚”，敲门声终于在深夜11点半响起。13公里的路程，父亲在雪地里走了整整5个半小时。

打开门，满身雪花的父亲，一脸疲惫地站在门口。

“孩子妈，吃药了吗？好点没有？”父亲来不及抖落身上的雪花，大步来到床前，拉住母亲的手。

“孩子爸，你还真回来了啊？20几里地走回来，一定累坏了吧？”看

着父亲脚下湿淋淋的一滩泥水，母亲的脸上，早已满是泪水。

“路滑不好走，等急了吧？”父亲眼里流露出焦虑和温柔。

“孩子爸，真是难为你了，快坐下歇歇吧。”母亲说。

夜里，为了让发烧的母亲尽快退热，父亲每隔一段时间，就把毛巾用水打湿后放在母亲的额头和手腕，间隔一会儿换一次，还用白酒为母亲擦拭手心和脚心。

“孩子爸，不用管我，你快去睡吧。”母亲疼得难受睡不着，却又心疼父亲跟着受罪。

“没事儿，我陪你说说话。”父亲说啥也不肯去睡。那一夜，父亲守在母亲床前寸步不离，一夜没有合眼。 徐光惠/文

## 朝花夕拾

### 吃“拨鱼儿”

上世纪60年代初，我正在上中学。每天还没到放学，肚子便饿得“咕咕”叫了。冬季里，每当我顶着凛冽的寒风推开门时，一股热气便迎面扑来。母亲总是慈祥地对我说：“饿了吧？别着急，歇口气再吃，压着凉气吃饭，肚子会疼的。”

让我至今回味无穷的，是那时偶尔能吃上“拨鱼儿”。我放学回家时，母亲事先把锅里的水烧好，和好一碗稀软面。她用锅铲挑起块面，然后用根竹筷子一拨拉，那一条条的面，犹如一尾尾活蹦乱跳的小鱼，翻滚着窜入水中。把煮熟的“拨鱼儿”捞到碗中，再浇上些用虾皮、葱花炆的蘸水，放上酱油、醋，再滴上一点儿香油。那诱人的香味，使我几乎将头埋在碗中，连汤带水一古脑儿吃个精光。我每次都吃得满头大汗，浑身热乎乎的，觉得舒服极了。

参加工作后，我走过了大半个中国，吃过不少美味佳肴，但是，从来没找到当年吃“拨鱼儿”时的感觉。 孙家汇/文

(编辑提醒：本版来稿要求内容真实、可信，所有来稿请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)

## 与作家谈歌合影

2013年2月2日，我去保定徐水刘伶醉酒厂，参加《保定广播电视报》举办的“我与刘伶醉酒的故事”有奖征文颁奖仪式，我的作品被评为二等奖。颁奖仪式上，我有幸结识了河北著名作家谈歌。我们虽是初次见面，却相谈甚欢，他还为我题赠了一幅墨宝作留念。颁奖仪式结束后，组委会组织与会者参观了刘伶醉酒厂的制酒工艺。参观期间，我（右为本文作者）和谈歌合拍了这张照片。 王日新/文并供图



## 和乡亲们喝“地瓜烧”

1968年，我们上山下乡到了河北省迁安县（今迁安市），被分配到县东北部一个村子插队落户。那里属于半山区，十分贫困，但乡亲们勤劳善良，热情淳朴，对我们如同对自己的儿女一般。那种热辣辣的情感，至今回忆起来，仍备感温馨。

我们下乡不久就到了春节。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，再穷的人家，逢年过节也得买上几斤肉，请亲戚朋友们坐上一桌。盛情难却，我们知青因此也成了乡亲们的座上客。主人热情招待，气氛热烈。8个人一桌，围坐在炕上，抽的是各自带的旱烟。极少数人家待客时，会摆上一包定价9分钱的“洋烟”。酒是8毛钱一斤的“地瓜烧”。每人面前摆上一个三钱的小酒盅，三盅一两酒。每个酒盅都斟满酒后，主人便开始殷勤地劝酒。我本来

烟酒不沾，可是坐在酒桌前，不抽烟就已经很另类了，再不喝酒，就显得特别不合群。于是我一咬牙，与大家一起端起酒盅，干！我一口把酒喝下去。好家伙！又苦又辣，火烧火燎地呛嗓子，眼泪都快流下来了，我张着嘴只顾喘气了。众人大笑起来。“地瓜烧”的度数超过60度，谁能喝上3两“地瓜烧”，那绝对是海量了。不过，我喝下第二盅的时候，喉咙就不那么难受了。第三盅酒下肚，头脑就有点儿发飘。再看看周围的人们，一个个脸上红扑扑的，话开始多起来，嗓门儿也高了，有人开始吹牛讲故事，什么苦呵累呵穷呵，暂时全忘了。

时光荏苒，50多年过去了。当年在一桌喝“地瓜烧”的乡亲们，大多已作古了。但乡亲们的热情淳朴，成为我永远难忘的记忆…… 阳刚/文

## 图说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 
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### 我们的价值观



天津人郑西楼

人民日報 中國網絡電視台